

数字人文对现代性价值范式突破的影响

余慕怡

(中南大学人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6)

摘要: 数字人文作为数字技术与人文研究的融合体, 通过创新研究、实践方式成为现代性价值范式突破的重要动力。从影响机理来看, 数字人文可以纠正工具理性、重构知识形态、促动文明竞合并重构传播媒介, 实现技术崇拜僭取的归元、教育革新力量的涌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及与国际话语权博弈的复归, 使现代性价值范式突破具有理论逻辑支撑。但仍需指出, 算法控制的权力统治、主体意识的伦理异化与数据盗取的文化侵略以及人文批判的属性压迫并存, 导致数字人文助力现代性价值范式突破面临现实梗阻。对此, 当从规制算法权力过度扩张与滥用、完善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生态、探索建立文化数据保护机制与维系数字人文运行批评性本质多维度着手, 助力发挥数字人文应有效能, 驱动现代性价值范式突破。

关键词: 数字人文; 现代性价值范式; 工具理性; 文明竞合; 国际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 B561;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0566(2025)08-0201-11

Impact of digital humanities on the breakthrough of modern value paradigms

YU MUYI

(School Of Humaniti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06, China)

Abstract: As a fus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Digital humaniti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romoting force for breaking through the paradigm of modern values through innovative research and practical metho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luence mechanism, digital humanities can correct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reconstruct knowledge forms, promote civilization competition, and reconstruct communication media, achieving the return of technology worship usurpation, the emergence of educational innovation forces, the populariza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the restora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games, providing theoretical and logical support for the breakthrough of modern value paradigms. It should still be pointed out that the coexistence of algorithmic control over power, ethical alienation of subject consciousness, cultural invasion of data theft, and oppression of humanistic criticism has led to practical obstacles for digital humanities to help break through the value paradigm of modernity. In this regard, efforts should be made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including regulating the excessive expansion and abuse of algorithmic power, improving the ethical governance ecology throughout the entire cycle, explor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cultural data protection mechanisms, and maintaining the critical nature of digital humanities operations. This will help to unleash the effectiveness of digital humanities and drive breakthroughs in modern value paradigms.

Key words: digital humanities; modernity value paradigm;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civilization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收稿日期: 2024-12-06 修回日期: 2025-07-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2&ZD258); 湖南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3YBQ008)。

作者简介: 余慕怡(1992—), 女, 湖南岳阳人, 博士, 中南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文论及文化关键词、数字人文。

技术进化理论认为,技术形式如同生物生命形式,始终在经历持续进化的过程^[1]。同时,技术奇点理论指出,特殊的技术进步可以驱动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智能,促使人类生活与文明发生根本变革。也就是说,技术层面的形态跃迁必然引发话语体系、生活方式及思维程序的变革,并随之衍生相应人文概念。基于这一逻辑辨析,数字技术的持续发展催生数字人文,并成为哲学、历史学科乃至经济范畴的重点关注对象。数字人文因其技术意义与作用主体不同,出现微观及宏观意义层面的概念差异,即微观层面的数字人文属于人文资料的数据替换,可以理解为借助数字技术与数据科学开展人文研究的动作行为,也可以视为人工智能一类技术支持下科研范式的转变;宏观层面的数字人文属于数字时代人文取向,可以视作工具理性对个人思维的淹没。从微观层面的作用逻辑来看,数字人文的建立使其具有数据要素的特征,包括替代性、智能性与共享性,且其内涵知识边界正在持续拓展,为现代性价值范式突破注入数据要素动力。进一步以宏观的人文取向逻辑为源点,数字人文以其文化规约、自觉图式、固定结构等形式,对个体原生的普遍性、原则性精神内涵与文化机理进行重塑,且其动力效率远远超过工业时代^[2]。由此而言,宏观、微观层面的数字人文均可实现人本主义思考方式的超越,促使原本附加于现代性概念上的价值取向与意识形态偏见得以脱钩,引致现代性价值范式在扩散发展中被加以改造并呈现多种图景,驱动现代性价值范式得以突破。

世界历史实践道路表明,现代性价值范式内在决定现代化的思维取向与实践道路,而悖反、失宜的现代性价值范式必然会导致现代化偏见甚至错误的现代化道路^[3],而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即美国、欧盟等西方发达经济体。具体而言,美国、欧盟等西方发达经济体现代性价值范式中的形式自由以及由此派生的公权极度受限理念,使资本主义的剥夺性积累肆意发展、社会分化难以克服、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逆流。从另一视角来看,现代性价值范式强调工具理性的主导,包括各类定量研究以及实证方法,特别强调人文同科学的二元对立以及人文学科的边缘化。数字人文作为时

代与历史的融合产物,同样具有工具理性的典型特征,促使人文研究及哲学范式发生从确定性到可能性、从实体到关系、从已知到未知、从二值逻辑到概率值等转变,为生成新的价值逻辑提供可能性。由此引发的思考是,数字人文对现代性价值范式突破的影响究竟为何?正面引向抑或价值偏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完善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治理体系”。《2025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围绕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作出“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培育生物制造、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 等未来产业”的战略部署。在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的关键节点,本文从数字人文宏观、微观概念的综合视角出发,探讨数字人文是否同现代性的伦理逻辑相互适应,这既是现代性哲学审慎思考范畴的方向创新,也是现代化社会经济探讨的探讨必要。

一、理论概述

(一) 数字人文的内涵边界

如前所述,数字人文具有微观、宏观层面的不同含义,必须充分厘清二者的内涵边界,为从宏观、微观的结合视角展开后续深入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微观层面来看,任何理论、概念均不会凭空产生,均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与生成逻辑。数字人文这一概念最先起源于人文学术研究领域,在探讨数字技术与人文学术的关联时提出,但其在出现初期本质上是两个概念的融合。美国杜克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凯瑟琳·海尔斯的专著《我们如何思维:数字媒体与当代技术创新》,曾围绕数字人文如何改变学术研究、教学、出版以及阅读展开深度剖析,强调数字人文这一范式可为人文研究提供便利。自此,延续凯瑟琳·海尔斯的观点,学界认为数字人文即将数字技术用于带有学者主体个性特征的人文学术研究,以及利用数字手段促使人文学术成果实现高效传播^[4-5]。不可否认,数字技术与传统人文学科研究促使有关学者脱离烦琐的资料搜集、检索桎梏,可将更多精力投入理论解析与创新思考层面,高质量促进人文学科研究提质增效。另外,也有学者基于数字技术特点,对传统人文发展水平进行测度^[6-7],进行数字人

文的初步探索。进一步来看,波兹曼在“媒介意识形态”理论当中着重强调媒介技术在文化形成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并阐明技术研究中所饱含的人文关怀。

重返人文的概念视角,人文属于人类创造借以达义的媒介、叙事的方式以及行动的学说。随着数字技术向不同领域持续渗透,具有革命性的数字化转型正在全球范围内全面深化,促使媒介、方式、学说框架下的人文精神与人文处境受到影响产生变革,并由此催生新的人文环境。因此,必须从数字时代的特征、人文环境的重构角度重新审视“数字人文”的含义复杂性,借此深刻洞悉数字人文对现代性价值范式突破的影响。从宏观概念层面的核心逻辑上讲,数字人文是同数字时代相伴的人文形态,是以数字抑或数据适当替代人的本位,重塑以人为本的传统人文理论结构。根据组织社会学的经典理论分析,组织环境的变化会对组织结构和组织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也就是说,数字人文的变化会促使社会生态发生转变。具体而言,数字人文以学术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社会意识思考的颠覆,形成多维力量交织、叠加与共振的发展趋势,成为现代性价值范式突破的驱动力量。从底层逻辑上讲,与传统人文学科专注于某一领域的“网格化”特征不同,数字人文具有融合性的突出特征,即借助计算机、互联网及大数据等工具协同梳理、整合传统人文学科的各项内容,并以“网络化”的紧密联系形式在更广范围内生成新的见解,为现代性价值范式突破提供优于传统人文学科的综合动力。当然,数字人文之中的数字占据绝对主导时,必然会使社会关系受到技术掣肘,形成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取,导致技术主义无节制蔓延,引发人文研究更大范围内的“失语”^[8],以至于出现技术控制人文主义价值的极端立场。然而,就现实研究进度与发展态势来看,数字人文的发展并未出现“数字”独大所导致的技术孤岛,也未产生人的伦理互斥^[9-11]。

(二) 现代性价值范式的发展历程

现代性价值范式的概念含义宽泛,故学界对其的批判、阐释已经超出单纯语义学的范围,有了极其复杂的哲学、美学、文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及文化学在内的多重内涵。置于本文的研究

框架,现代性价值范式是对现代化发展历程的呈现状态、典型特征、价值理念的哲学反思与规范评价,展示社会的结构转型与文化转型,属于哲学话语叙事体系^[12]。马泰·卡林内斯库^[13]在分析现代性的类型时提及,“只有在一种特定的时间意识,即线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逝的历史性时间意识的框架中,现代性这个概念才能被构想出来”。沿袭这一思路来看,现代性价值范式具有明显的历史属性,在不同阶段对应价值范式的本质含义有所区别。可以将现代性价值范式的发展历程理解为两个部分,包括前期资本主义主导与后期社会主义新兴的现代性价值范式。

就前期资本主义阶段而言,现代性价值范式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为标志,实现普及、发展的动力来源于剩余价值的追求及资本积累的欲望,而资本主义的矛盾、危机、异化与阶级斗争均是现代性价值范式受到冲击的表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进行详尽描述,指出资本主义通过生产关系变革构建社会秩序,形成“自由、平等、民主”的现代性价值范式,这同现代性价值范式的物质福利、个体自由与自律建构互相呼应^[14]。在物质形态公共性与普遍性持续发展的基础上,资本主义主导下的物质资源、物质财富越来越符号化、观念化,逐步形成资本的社会性力量^[15],由此构成西方现代性价值范式。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西方现代性价值范式的生成及发展已有300余年历史,在此过程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然而,这一现代性价值范式始终潜隐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化的矛盾,恶性破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致使经济危机在世界范围内频发。基于社会历史事实,西方现代性价值范式受到学界的广泛质疑,处于“已然失败”(麦金泰尔语)抑或“仍未完成”(哈贝马斯语)的矛盾状态,而这一矛盾衍生“现代性问题”与“现代性危机”^[16-17]。

就后期社会主义新兴阶段而言,现代性价值范式是以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发展为标志,核心目的是驱动“人的发展”。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与西方现代性价值范式的工具理性泛滥不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强调“人的本位”，主张的现代性价值范式是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统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的本质要求，正是中国社会主义所主导的现代性价值范式逻辑体现。西方现代性价值范式是以追求资本增殖为标的，却引发人的“去价值化”；中国现代性价值范式则是人的本质的复归，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在现代世界的文明逻辑体系，西方现代性价值范式促使工具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使人的异化与物化逐渐深化。而中国以人的本位驾驭资本逻辑的现代性价值范式，却在突破西方现代性价值范式框架时遭遇资本围堵。因此，在世界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寻求现代性价值范式突破路径成为各界研究的重点。

三、数字人文对现代性价值范式突破的影响机理

(一) 纠正工具理性：技术崇拜僭取的归元

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技术创新与进步总在“旧的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已经难以持续”时提供创新动能，促使人类生产方式不断变革，满足社会、经济、政治稳定发展的需求。在这一背景下，人类思想史上出现技术崇拜流派，即强调技术发展不受人类意志、社会机制的控制，盲目信奉技术的自由与救世逻辑，且在现代经济体系中表现得更加赤裸，由此出现技术崇拜的本位僭取现象。尤其是 2017 年后 Transformer 模型的出现，系列生成算法与多模态模型也随之成熟，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成为技术崇拜的主要对象。技术崇拜本位僭取本身是指技术应当作为人类的工具而存在并显示内在价值，而非脱离人类控制出现“硅基生命掌控碳基生命的世界”^[18]。在一定程度上，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智能生产力发展不仅推动经济模式的转型和升级，且在更深层次上持续推动社会形态的演进变革^[19]。长期以来，社会各界总是习惯性地认为人文研究与技术分属不同领域，甚至二者总是以“对立”局面出现，而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即是技术崇拜的本位僭取所导致的工具理性越位^[20]。

数字人文的出现使以往技术与人文的互斥缓解获得可能性，体现在数字技术解决传统人文学

科问题以及人文纠正工具理性。前者属于研究效率的技术加持范畴，是浅层意义上的技术崇拜纾解；后者属于唤醒技术层面的人文内涵，是深层意义上的工具理性纠正，也是数字人文助力现代性价值范式突破的要点所在。具体而言，数字人文是价值理性层面的新型人文形态，可使数字技术发展受到人文价值的指引，由此反思、限制、规范技术崇拜本位僭取主义的工具理性越位，避免人类社会陷入技术收益的物质陷阱，突破现代性价值范式的“物的异化”。从实践层面上看，数字人文即通过文化、文物所蕴含的价值内容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形成具有丰富内涵与正确价值观的产品，打破资本主义现代性价值范式对人的无底线异化局面，由此否定所有强加于个人层面的技术规则，阻止工具理性的无边界扩张。在一定程度上，数字人文并未脱离人文的研究范畴，而其根本作用即通过教化功用抑制肆意扩张的技术崇拜主义，并利用数字技术广扩散与强适应的优势放大这一功效，使依赖技术的工具理性与现实追求的价值理性处于平衡状态。另外，在长期的发展实践中，西方国家凭借技术崇拜本位僭取具有控制全球的“标准”，包括所谓的人权标准、价值标准与贸易标准，并利用所谓标准裁量其他国家与地区，形成西方主导的现代性价值范式。数字人文的发展即利用技术与人文的融合打破西方现代性价值范式的框架限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驱动技术崇拜僭取的复归。

(二) 重构知识形态：教育革新力量的涌现

数字人文作为数字技术与人文研究相互结合的交叉领域，正在深刻重塑人文学科的教学研究方式，使知识形态发生载体渠道变革，是教育革新力量的典型代表。解构数字人文场域下教育逻辑的存在，势必需要统计、经济、数据科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与人文学科的协作，而数字人文的发展促使教育体系重塑传统知识形态，明晰技术工具服务于人文关怀的目标，培养具有复合型知识结构和跨学科思维方式的人才。尤其进入数据主导的教育阶段，识别、获取、分析、评估、批判性解读和可视化呈现信息，以及使用数字工具解决人文问题，可以培育问题分解、模式识别、抽象化和算法设计等计算思维能力，助力教育模式升级。而中

国长期重视人文的教育属性特点,充分遏制数字人文知识形态可能存在的局限性和潜在偏见,使其在合适的教育逻辑中发挥应有效能。与西方人文学科“无利可图”的特征促使其被资本排斥在外逐渐走向普遍式微不同^[21],中国数字人文的发展条件是人文在“先”、技术在“后”。这一基础上,中国数字人文在不断地发展中深刻揭露资本主义所导致的普遍危机,从西方教育适应工业界的再生产模式培育适应持续变化的职业需求的劳动力的现代性价值范式实现校正。同时,数字人文借助数据要素与数字技术的支持强化批判效果,使人类社会能够符合逻辑、辩证性地思考社会问题,校正被西方世界扭曲的教育逻辑,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价值范式的突破与塑造。另外,数字人文也可通过“计算批判”质询社会表征,使传统人文跳脱于狭隘的目的性服务范畴,通过纳入种族、阶级、性别经验等教育内容,充分揭示社会话语体系占据、意识形态偏见等西方教育逻辑中缺乏的部分^[22],以塑造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现代性价值范式。

西方教育世界曾意图通过数字人文接管教育逻辑标准的制定,而这遭到西方数字人文学者的强烈排斥。身处数字人文旋涡中心的弗朗科·莫莱蒂曾明确表示,“数字人文并没有与新自由主义结盟的诉求”。此时,教育逻辑更侧重于直接的功利价值,同社会并无直接利益关系的人文学科成为边缘化的产物。不可否认,数字人文曾因自身反思性与批判性内容的缺位,一度为各界学者所诟病,包括数字人文研究体系内部。但对中国的教育体系而言,数字人文在人文、历史与哲学的信息拥有量方面更加丰富,可从更为宏观的角度看待原本独立的现象,通过校正教育逻辑拯救不断弱化的身份认同、逐渐衰微的情感态度以及民主制度的政治冷漠,对抗西方现代化价值范式的冲击。在数字人文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涉及更深层次的教育逻辑分歧必须触及,促使数字人文能够在辨析、剔除异化价值观点的过程中,实现工具主义的反思,发挥教育革新力量对现代性价值范式的正向作用。

(三) 促动文明竞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及

在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西

方国家强行推广所谓“普世”现代性价值范式及其实现形式,而其背后的哲学观点是文明优劣与文明冲突理论。也就是说,在“普世”现代性价值范式当中仅有西方文明属于先进文明与优等文明,其他文明均属于落后文明,且必将被西方所谓的先进文明同化,充斥混乱和悖谬的“历史终结论”即源于此。实践证明,西方主导并推广的“普世”现代性价值范式并未实现社会安定有序、经济稳定发展与人民幸福安康,反之出现的是社会动荡、持续战乱与流民丛生,甚至渐次诱发全球化解体。此背景下,数字人文凭借其跨学科、交融性的特点促动文明竞合,强调不同文明之间并无高低之别与优劣之分,以交流孕育融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普及,突破“普世”现代性价值范式的封锁。

依托数字人文的数字技术融合基本特征,文化、艺术、教育、体育等文明构成内容可借助数字技术实现再创作,促进文明互鉴与文化自我深化,实现人文交流的价值共享。同时,数字人文的“数字接触”可实现全球不同空间个体“云在场”,借助社交直播平台、自媒体(self-media)等渠道,以及非同质化通证、虚拟仿真等数字技术,将文明交流变为一类超越传统媒介和空间差异的共同体建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数字人文在计算思维与定量建模的阐释、分析基础上依托定性研究与批判思维进行问题求解,可在一定程度上促动文明竞合。以专业角度阐释,具体过程即将实际问题抽象为数学问题,并通过编程算法、运算操作进行答案计算,最终获得批判性的结论^[23]。不可否认,现有国际秩序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国家主导,且国际规则中主要体现西方的“普世”现代性价值范式。而数字人文场域下的人文学者利用数字技术汇聚不同文明形态下的历史、文化、宗教、地理、制度、民族要素,驱动不同文明在竞争中合作,深刻洞悉西方“普世”现代性价值范式分裂世界、制造对抗的本质,在文明竞合中推动秉承互利共赢、团结合作理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普及传播,突破西方“普世”现代性价值范式的影响边际。综上所述,依托于数字人文的文明竞合可提升文明之间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有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脱离本质是暴力威慑、政治控制、

市场掠夺的“普世”现代性价值范式牢笼。

(四) 重构传播媒介: 国际话语权博弈的复归

在“零和博弈”的战争主题逐渐退出全球化的背景下, 诸如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气候变化的责任分担等代表现代性价值范式的议题, 已逐渐演变为国际话语权的争夺要点。依据科学逻辑审视, 国际话语权应当依靠道义性、人文性、契约性权力作为主导决定因素, 而物质性、制度性、要素性权力是辅助决定因素^[24]。然而, 在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态势下, 西方在发展中将经济、军事、人口、技术等方面的物质性权力塑造为主导国际话语权的重要依托, 而人文理论的辩证渐被淹没。在这一背景下, 经济活动似乎已经替代人文理论成为国际话语权争夺的媒介, 且西方依仗经济分工的主导以及“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口号, 垄断国际政治格局的塑造权、规则制定权以及争议裁量权, 利用经济活动传播其所代表的现代性价值范式。与西方强行制定的国际话语权要素结构不同, 中国在国际话语权的塑建中不仅重视物质性权力的发展, 也相当重视人文思想的道义指导。在一定程度上, 数字人文的内容覆盖表述形式与事件对象, 体现的道义高度认知及意识形态内核均具更强说服力, 且因数字技术的不可控性而脱离组织的控制, 使国际话语权的传播媒介复归于人文性内容, 为打破西方现代性价值范式的框架提供重要支持。

表面上看, 国际话语权建构及其附加的现代性价值范式看似属于政治博弈, 而其核心的传播媒介依然属于意识形态创新、逻辑重塑及其有效输出的人文社科内容, 这就必然需要实现人文社科领域的繁荣复归。此背景下, 数字人文的技术特性决定人文学者可以利用现代科学更新传统的人文理论研究, 促使人文学者能够脱离烦琐的资料搜集、理论整合与结论检索的基础性工作限制, 使其能够在理论建构、阐释及创新方面产生更多建树, 为国际话语权复归夯实人文理论的媒介基础。在此基础上, 数字人文可以促使人文领域的理论成果“数字化”, 基于“以理服人”的话语逻辑实现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广泛传播, 撼动西方依靠掌握国际话语权进行现代性价值范式传播的牢固地位。另外, 数字人文所形成的传播媒介并非

独立的思想世界, 而是根据海量人文理论真实数据掌握的现实世界, 是排斥物质性权力的博弈抓手。在以往的国际话语权博弈过程中, 人文作用已经逐步走向萎缩乃至消亡, 使经济、军事等物质性权力成为国际话语权博弈的唯一媒介, 也导致现代性价值范式由掌握物质性权力的国家、地区决定。正是在这一语境下, 数字人文的产生及发展标志具有转折与革命意义的人文学科形态变革, 使人文学科在国际话语权博弈中的媒介地位复归, 助力现代性价值范式突破。

三、数字人文助力现代性价值范式突破的现实掣肘

(一) 算法控制的权力统治: 本质忧虑

数字人文自诞生以来就成为各界争议的焦点, 有关论争不仅局限于数字人文的概念范围、学科属性以及本质反思, 更多原因在于数字人文同机器算法存在深度关联。尤其是在数智时代, 技术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变化较为突出, 在合理合意的伦理框架与秩序下发展已难以高效判定^[25]。从数字人文的微观概念上讲, 教育领域的学者借助数字技术与数据科学开展人文研究的动作行为, 涉及搜索信息、使用信息的环节。此时, 搜索信息的过程隐含算法推荐, 而控制算法就必然存在算法权力滥用的情况。具体而言, 数字人文研究过程中使用的推荐算法或分析模型可能是由外部人员设计的, 对应存在的训练数据可能包含历史偏见、文化刻板印象、权力结构。此时, 控制算法即可导致数字人文研究成果蕴含偏见, 使其偏离科学、可靠的底线。深入解析来看, 数字人文的研究成果均是在算法支持下完成的, 而当下人文领域学者的知识结构并不足以把握算法的逻辑及机制, 甚至可以认为算法对于人文领域学者是不透明的工具。也就是说, 现代性价值范式背后的国家或组织可以通过算法控制实现权力统治, 诱发现代性价值范式形式突破而本质并未转变的忧虑。Lazer 等^[26]提出“社会算法”, 指出计算程序可以掌握、评估个体期待, 并将其视为一类社会权力控制个体, 深刻揭示算法控制的权力统治后果。结合现实生产、生活的算法侵害来看, 特定利益集团已经通过算法歧视、垄断、黑箱、遮蔽、共谋、剥削等方式强化个体与政治控制。其中, 个体

层面主要使用算法强化“信息茧房”，诱发人的认知窄化风险；政治层面主要应用算法进行社会控制，酝酿政治风险。深入来看，特定利益集团利用数字人文内嵌算法建立针对个人价值取向、行为动向以及政治观点在内的数据观测节点，并借助信息媒介向特定群体灌输政治理念与价值观点，固化利益集团所期望的现代性价值范式。例如，美国前中情局职员、“棱镜门”事件爆料人爱德华·斯诺登所提供的文件显示，“五眼联盟”^①曾基于社会工程学实施“网络魔术师”项目，即通过国际网络空间发布虚假信息操作网络言论体系，引导自身所认为的现代性价值范式。尤其是在嵌入算法后的数字人文体系中，利益集团依靠自动生成、定向推荐、数据训练等技术建立行动思想的链接，并实现“信息找人”的传播范式转变。彼时，算法学习及其应用能力的差异就必然造成国家之间意识形态互动结构的失衡，甚至对异于自身的现代性价值范式进行精准引导和靶向干预，使其陷入“强者制定规则”“弱者遵守规则”的框架无法突破。正如《算法霸权》作者凯西·奥尼尔告诫，人类需要警惕不断渗透和深入我们生活的数学模型——它们的存在，很有可能威胁我们的社会结构。

（二）主体意识的伦理异化：角色疑惑

结合前文论述，无论从微观抑或宏观层面的概念来看，数字人文均需要数字技术与人文内容并存作为基础条件。尼克·波斯曼曾将人类文化发展区分为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以及技术垄断文化。在数字人文发展初期，数字技术逐渐渗透至不同领域形成数字出版、数字文化、数字资源、数字媒体等多种业态，尚属于工具使用文化阶段，因其本质依然是人的主体意识作为主导。然而，随着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人类已经淹没于浩瀚的信息汪洋，似乎技术含量已经成为价值评定的唯一标准^[27]。面向数字技术持续发展的态势，数字人文已经涌现技术主导与人的主体意识的伦理冲突现象，也就是说难以辨识数字人文产品属于技术延伸抑或解释产物，衍生数字技术代表的工具理性与人文内容代表的价值理

性之间的角色矛盾。具体而言，在数字人文对现代性价值范式突破的影响过程中，数字人文在数字技术扮演主要角色时必然成为工具理性的代表，以标准化与结构化的特点促使不同组织始终在理性条件下追求特定的算法目标，由此逐渐被数字技术所产生的高额收益俘获。而这一状态属于“反人文”的绝对技术主导局面，导致数字人文作用于现代性价值范式突破时丧失人体自然的价值理性与人文关怀的主观思维，无视现代性价值范式中的人文归宿，甚至已然成为现代性价值范式突破的羁绊。另外，数字技术几乎克服传统现代性价值范式传播可能遭遇的任何障碍，包括时间、空间距离以及文化传播层面的语言壁垒，促使数字人文中数字技术的自主性与他者性持续增强，对人的主体意识依赖则逐步降低。在数字技术的“极权”统治下，他者必然逐渐消失并进入同质时代，由此导致人类的感知能力、对事物的记忆能力遗失，而后普遍进入现代性价值范式不可融合、不可进化、不可变革的固定框架。正如张耀铭^[28]所指，数字人文并非在技术祭坛上牺牲人文，而是数字与人文的融合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数字技术的角色侵占使数字人文中的人文属性被碾轧并异常平庸化，由此衍生主体意识的伦理异化，使数字人文在推动现代性价值范式突破时丢失人的主体意识。

（三）数据盗取的文化侵略：安全隐患

就现实世界运行情况来看，数字人文本质属于“文盲”，因其所有结果均是建立在已有知识成果基础上计算训练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利用海量资源数据中的知识碎片“拼凑”输出的结果。而数字人文必须是在合法、合规、合乎伦理地利用数字技术处理和分析人文数据，以促进人文研究和文化传播。而数据盗取（未经授权获取、复制、使用或传播受保护的数据）则直接违背了这一核心原则，可能使数字人文的研究出现违背伦理以及违规违法一类的问题。因此，部分特定利益组织借助数字人文这一特性进行数据盗取，且会借助数字技术的互联特性在系统内扩散，进一步产生影响研究结果、干扰意识形态的连锁反应^[29]，诱发现

^① 五眼联盟是由5个英语国家所组成的情报共享联盟，成员国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代性价值范式塑建的安全隐忧。2023 年 3 月, OpenAI 发布 ChatGPT 临时中断服务的报告, 指出 1.2% ChatGPT 用户数据被盗取, 而基于这一部分用户数据所进行的数字人文研究, 已经违反科学研究的伦理道德规范。引申至文化领域的数据盗取, 这一结果将会更加严重, 甚至导致数字人文对现代性价值范式突破的影响完全转变为负向。以中国为例, 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推动下, 各级各类文化机构积累海量资源数据, 推动形成数字人文的基础数据库。在此背景下, 其他国家可能利用人工智能抑或大语言模型对公开论文成果、个人社交平台的开源数据进行捕捉挖掘, 窃取中国特有的文化数据并采取针对性的破坏措施。尤为关键的是, “文化基因数据被盗取, 民族的历史文化会被改写”^[30]。数字人文的技术特性使以书籍、物品等实体物品为载体的规训方式难以为继, 并借助数据的高效传播、双向互动及视图展现功能打造更具视觉冲击与更低理解成本的产品, 在无形中加剧不良现代性价值范式的渗透, 造成国内意识形态与政治安全等现代性价值范式的安全隐忧。迈入数字人文时代, 文化数据在国际层面的交流共享已经成为必然趋势, 却也存在部分国家依靠经济、技术实力进行文化数据盗取实施文化侵犯的问题。当然, 更有甚者凭借数字人文载体——全球媒体资源的掌握, 将其拒斥的现代性价值范式扭曲为媒介传播的固有成见, 不断解构、污名化不同立场的现代性价值范式, 使数字人文助力现代性价值范式突破时面临阻力。

(四) 人文批判的属性压迫: 道路疑窦

卡尔·波普^[31]曾经提出“社会技术”理论, 强调由问题出发提出理论与假设, 并通过批判检验与消除错误达成社会改革与改良的目的。人文研究同社会技术遵循同一论证逻辑, 通过系统性调查各类文化现象并对背后意识形态的运作过程及其与权力的共谋关系进行批判。在菲尔斯基、康德等人文学者的推动下, 批判属性已经成为人文研究重要的思想传统, 形成“任何不去批判的都必然是非批判的精神”范式。然而, 数字人文批判属性却在数据的控制下受到压制, 使现代性价值范式突破时产生道路疑窦。概而言之, 数字人文主要面向大数据库进行文本挖掘与数据分析, 进一

步使用数据统计手段进行综合处理并得出相应结果。也就是说, 数字人文仅局限于阅读、观察、体验、感悟、思考已有的内容进行批判, 陷入技术化、程序化与模式化的误区而丧失人文研究的批判属性, 导致数字人文对现代性价值范式突破的影响逐渐弱化乃至消失。同时, 基于海量数据分析的输出结果是按照观点数量整合而来的, 这同前文控制算法的逻辑一般, 即可以通过增加观点数量控制输出结果^[32]。由此, 现代性价值范式背后的国家、组织可以通过增加非批判观点数量, 使数字技术在针对海量数据分析时默认自身的现代性价值范式趋于完美, 从而避免批判内容出现, 提升自身现代性价值范式的牢固性。另外, 在数字人文的数据分析工作中, 数据必须呈现事实而非观点, 方可实现技术的正向利用, 进一步依托事实批判现代性价值范式的弊端, 进而推动现代性价值范式突破。不可忽略的是, 数字技术尚处于探索发展阶段, 难以在数字人文研究范畴中判断事实与观点的差异, 引致数字人文根据事实开展批判的属性受到一定压制, 难为现代性价值范式突破提供即时动力。固然, 也有观点认为数字人文通过知识图谱、文本挖掘、数据分析等方式打破旧有批评观念与相对僵化的批判范式, 推动人文批评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单一转向综合^[33]。但就现实来看, 海量而便捷获取的成果数据成为研究人员获取素材的重要渠道, 但造成人文研究人员抄袭、重复性批判, 真正具有批判创见的成果反而越来越少见。如此一来, 以数字人文为动力源批判现代性价值范式的弊端效果难以凸显, 最终难以突破现代性价值范式的固定框架。

四、数字人文助力现代性价值范式突破的现实启示

(一) 规制算法权力过度扩张与滥用, 发挥算法服务效能

依据前文所述, 数字人文助力现代性价值范式突破的重要依托即为算法, 核心运行逻辑即依据问题定义与已有数据集合选择适宜算法, 形成支撑现代性价值范式突破的合理算法服务。不可否认, 算法权力的过度扩张与滥用促使数字人文的本质形态发生转变, 难为现代性价值范式突破提供技术动力。对此, 应从多方面着手规制算法

权力的过度扩张与滥用,发挥算法服务现代性价值范式突破的驱动效能。首先,开发不同领域的算法机制,避免算法误用。平台主体及算法模型领域人员应针对文化、历史、哲学等人文内容探索开发对应算法机制,避免具有歧视性、非领域性的算法开发,规范数字人文支撑现代性价值范式突破的算法开发与运行基础。在此基础上,数字人文领域学者应当针对问题和数据集合的实际情况,对开发的标准算法进行参数调整,使其更加贴合人文领域需求。其次,打造透明公开的算法机制,便于外界监督。平台主体及算法模型领域人员应当根据合理适度的基本原则,在维护底层技术逻辑、知识产权及商业机密的同时,适当提高算法的透明度、配置算法的解释权,向外公开算法技术的基本原理、运行机制与目的意图。当然,这一过程中教育部门也应明确数字人文领域算法开发的红线、底线,规制数字人文的算法权力范围,使其能够发挥现代性价值范式突破的正向推动效能。最后,建设主流价值导向的算法机制,实现算法驾驭。政府部门应当根据现代性价值范式突破要求,将“筛选数字人文信息内容”融入算法推荐生态,引导算法为正向现代性价值范式突破提供价值增量。在此基础上,强化数字人文信息内容分发阶段的管理机制,将蕴含正确价值认同与价值选择的高质量内容推荐至用户群体,使数字人文真实成为现代性价值范式突破的新引擎与新动力。此外,算法模型领域人员应当在算法工具及软件系统的易用性方面着力进行突破,适应人文学者不善用于高度复杂的深度学习模型的基本情况,实现信息科技与人文学科的双向互动,为现代性价值范式突破提供数字人文的跨学科动力。

(二)完善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生态,筑牢人的本位立场

数字人文的发展潮流不可逆转,对应技术构成要素塑造时代的历史进程难以干预,使现代性价值范式突破面临技术极权影响。如前所述,技术极权在数字人文场域下的发展必然威胁人类的思想空间与未来命运,诱发人与技术的伦理思辨。在这一背景下,如何捍卫人的本位立场这一问题,已成为数字人文助力现代性价值范式突破伦理解

惑的必答要点。首先,健全信息采集阶段的伦理治理机制。政府部门需充分强化数字人文研究领域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个人敏感信息、先进技术保密信息及其他未公开信息采集的伦理审查,确保信息采集符合伦理要求,使数字人文的数据调用合规合法。在此基础上,政府网监部门可定时巡查门户网站、应用系统以及终端存储的涉密数据动向,并对涉密信息使用去向进行全流程监管,避免有关信息用于非研究的规则范畴。其次,完善信息分析阶段的伦理治理机制。政府部门及用于数字人文信息分析的软件开发单位应对数据调用和信息分析过程进行伦理管控,及时介入具有歧视性决策的数字人文研究项目,避免决策分析带有偏见,影响现代性价值范式导向。同时,任何数字人文研究项目均应保持可追溯性与问责制,记录、跟踪数字人文分析决策的全生命周期,对违法违规利用数字人文产生不当行为进行追责,提高现代性价值范式误导成本。最后,完善结果输出阶段的伦理治理风险。数字技术、人文领域学者可协同合作,采用“技术制约技术”的方式推进对抗性学习模型研究,以此建立结果输出的伦理风险防控系统,预防数字人文研究结果在现代性价值范式突破中应用场景存在潜在伦理风险。另外,数字人文研究人员应当确保输出结果具有可解释性,通过隐层应用可视化方法将输出结果转化为易于理解且具有实际含义的产品,能够洞悉产品蕴含的现代性价值范式,避免输出结果引起伦理冲突。当然,数字人文的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除应用数字技术之外,也需设立对应管理人员岗位实施人工监督,以确保数字人文运行项目符合人类的伦理规范与价值导向,避免数字人文对现代性价值范式产生负面影响。

(三)探索建立文化数据保护机制,开发文化深层价值

数字人文为现代性价值范式提供生存、发展的空间,支持借助数据分析、管理、应用驱动现代性价值范式突破,这也是数字人文为善的首要表现。在数字人文持续发展态势下,文化这一体现现代性价值范式的内容数据总量必将持续增长,而文化数据盗取的安全隐忧已然成为数字人文助力现代化价值范式突破的重要梗阻。第一,强化

文化数据认证保护。政府部门应利用区块链的 ESCDA 技术对征集的文化数据添加数字签名,并利用区块链的不可篡改特性对文化数据产权、数据质量和使用流程进行全面监管和追溯,避免文化数据窃取与篡改,维护文化隐喻的现代性价值范式安全。同时,政府部门也可将文化数据纳入社会治理体系,建立保护范围电子围挡、明确主体责任,结合国土资源遥感卫星监测、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监测系统提升文化数据保护力度。在此基础上,对应文化数据库管理人员应当积极通过国家文化大数据标识注册中心,增加文化资源数据、文化数字内容及其关联关系的认证标识,避免国外机构组织或个人盗用有关文化数据。第二,强化文化数据流通保护。对于国外机构申请使用文化数据进行人文研究、商业行为在内的活动,文化数据持有组织、个人应当经过国家主管机关批准后合法提供。同时,持有组织、个人应当及时跟踪文化数据使用过程及最终结果,发现利用文化数据诋毁意识形态、价值思想的行为,应当及时停止文化数据使用授权,避免现代性价值范式的冲击。另外,教育部门也需对国外数字人文研究成果的输入进行深度监测,禁止隐藏西方负面思想的成果流入国内,避免西方文化数据的污染与现代性价值范式的逐步渗透,筑牢国内文化数据的安全网。在文化数据全面保护机制支撑的条件下,国内文化组织、单位可借助数字人文的便利传播条件打破信息壁垒,通过与国外数字人文实验室建立合作形成资源互补关系,并利用文化数据共享实现意识形态与文化传播,为现代性价值范式突破提供数字人文支持。

(四) 维系数字人文运行批评性本质,校正技术伪善偏向

批判性思维属于常规的人文内涵,同人的开放性、超越性联系时便协同构成人类文明进步与现代性价值范式突破的主体性条件。就当前来看,数字人文的批评性仍然停滞于技术工具、算法数据等“数字”层面,并未延伸至“人文”的社会、经济、文化领域,并不利于现代性价值范式突破。在数字人文助力现代性价值范式突破过程中,批判性本质的丢失必然导致独立观点、原创成果乃至脱离问题导向范畴,陷入技术伪善的困境,难以实

现现代性价值范式突破。对此,当深度维系数字人文运行批评性本质,校正技术伪善偏向。其一,发展基于通识的数字人文教育,重视新生代数字人文学者批判性思维培养。在批判理论层面,高等院校需维持《批判性思维与方法论》《哲学导论》《逻辑学》等基础课程教学,培育新生代学者的抽象思维与批判辩驳能力。在此基础上,高等院校需按部推进数字人文课程选修、专修以及专业设立,并在数字人文教学过程中对数据真实性、信息可靠性以及结论合理性进行不断的质疑、反思与修正,培育形成新生代数字人文学者的批判思维,避免完全技术导向的发展偏向,以批判性助力现代性价值范式突破。其二,打造差异化的数字人文基础设施,避免强制统一标准的偏向。各数字人文研究组织、机构、个人应使用差异化的数字人文基础设施,允许设置差异化的批判标准运行机制,对数字人文项目进行多方位的批判,由此不断校正技术依靠的“伪善”偏向,助力现代性价值范式突破。当然,数字人文研究主体也可基于已有数据库,通过领域内的数据准备、规律寻找、可视化表达等数据挖掘,为人类批评主体的阐释、价值分析工作提供基础支持,维系数字人文运行批评性本质,以支撑现代性价值范式突破。

五、结语

自 15 世纪所开启的西方现代化运动,除通过应用技术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之外,更是通过资本、权力及知识的组合重构社会生产方式,由此衍生现代性价值范式。然而,基于资本世界运行逻辑的全面物化过程,促使现代性价值范式成为支配人类的意志与行动的异在性力量,是悖论性的产物。在马克思的批判框架中,以西方资本主义为主导的现代性价值范式,同资本主义所助长的拜物教意识共同巩固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奴役。因此,突破现代性价值范式成为世界性乃至世纪性的难题,也是需要持续展开、不断深化的重要课题。数字人文作为一类新型学术模式、组织形式与文化模型,推动数字技术的思维方式、语言同柔性的人文逻辑相互交织,以数字技术的优势与传统人文所具有的思辨性、批判性深度融合,为现代性价值范式突破提供创新动能。由传统人文至数字人文的转变,与其说是研究范式的转换升级,不

如看作在当代数字环境中重新寻求人文研究的复归。不可否认,数字人文对现代性价值范式突破的影响仍是处于探索过程的研究范畴,需要在不断地探索中反思研究方式、内容,而这将是全球各国学术在全球化格局中重点探讨的问题。当然,必须慎重对待数字人文超越人类本位的趋势,倘若数字人文不再接受人文主义规训,脱离服务人类社会的工具作用,必将促使人类社会堕入数字奴役的恶劣处境,甚至重归奴隶时代的价值范式。

参考文献:

- [1]余南平.通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权力重塑[J].中国社会科学,2025(4):41-59,205.
- [2]李河.从“代理”到“替代”的技术与正在“过时”的人类?[J].中国社会科学,2020(10):116-140,207.
- [3]张振波,金太军.复合现代性:中国现代性范式及其政治秩序图景[J].文史哲,2020(3):12-19,165.
- [4]任剑涛.数字人文:数字主体的或是人文归宿的?[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3(2):5-16.
- [5]傅予,李博然,徐拥军.数字人文视角下文化资源数字化开发和传播要素与影响机理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23,67(20):45-57.
- [6]张红历,秦志,董春,等.2000—2017年中国人文发展水平及其时空异质性研究[J].中国软科学,2022(3):88-98.
- [7]牛叔文,李真,梁曼.人文发展的多维测度及其政策启示[J].中国软科学,2021(5):99-110.
- [8]金姿姝,吴静.数字人文是“人文”的失语吗?:重审数字人文中“人文”的角色与价值[J].山东社会科学,2025(1):65-75.
- [9]STEFANO F, ANTONIO P M, UMBERTO P. Digital humanism in business models: unveiling value creation mechanisms [J]. Transforming government: people, process and policy, 2024, 18(3):340-352.
- [10]丁华东,周子晴.数字人文:数字时代社会记忆再生产的新景观[J].情报科学,2023,41(11):1-7,27.
- [11]LIU R, MCKAY D, BUCHANAN G. Sociotechnical factors affecting interoperability of digital humanities [J]. Proceeding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4, 61(1):218-231.
- [12]韩庆祥.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逻辑[J].中国社会科学,2023(7):100-114,206.
- [13]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8.
- [14]包利民,孙仲.“新科技革命”与现代性价值范式的突破[J].社会科学战线,2018(1):23-30,2.
- [15]晏辉.类哲学视域下的现代性困境及其超越[J].中国社会科学,2023(8):162-182,207-208.
- [16]万俊人.现代性的多元镜鉴[J].中国社会科学,2022(7):4-20,204.
- [17]赵义良.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道路的现代性特征[J].中国社会科学,2023(3):47-59,205.
- [18]韩秋红.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整体状况的思考[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4,10(9):79-89.
- [19]孙伟平.智能时代的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发展动力[J].中国社会科学,2025(3):42-59,205.
- [20]王宁.作为一种人文学术范式的数字人文[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31(12):1-12.
- [21]赵薇.如何在“建造”中思辨?:数字人文论争反思[J].山东社会科学,2024(10):79-91.
- [22]夏翠娟.数字人文的理论沿革和范式转向:从“人文研究的数字方法”到“后数字时代的人文研究”[J].中国图书馆学报,2024,50(5):83-101.
- [23]WING J M. Computational thinking [J].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2006, 49(3):33-35.
- [24]岳圣淞.场域视角下的国际话语权:理论、现实与中国实践[J].当代亚太,2020(4):124-155,159-160.
- [25]江小涓.数智时代的秩序重构与治理合作:合理合意双重目标[J].管理世界,2025,41(5):1-14,58,241.
- [26]LAZER D, PENTLAND A, ADAMIC L, et al.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J]. Science, 2009, 323(5915):721-723.
- [27]陈凡,李嘉伟.技术作为他者:人与技术伦理关系的新思考[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75(6):50-59.
- [28]张耀铭.数字人文的张力与困境:兼论“数字”内涵[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1(4):1-11.
- [29]陆瑶,施函青,周欣怡.中国企业数字技术风险暴露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来自大语言模型的文本分析证据[J].经济研究,2025,60(2):73-89.
- [30]张旭,王逸凡.融入与共生:ChatGPT在数字人文中的风险应对与前景展望[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24(5):78-86,106.
- [31]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45.
- [32]赵志耘,徐峰,高芳,等.关于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若干认识[J].中国软科学,2021(6):1-12.
- [33]黄水清.人文计算与数字人文:概念、问题、范式及关键环节[J].图书馆建设,2019(5):68-78.

(本文责编:希文)